

曾国藩研究丛书
王继平◎主编



曾国藩 的思想与事功

湘潭大学出版社

曾国藩研究丛书
王继平◎主编



曾国藩

的思想与事功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的思想与事功 / 王继平主编.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08.12

(曾国藩研究丛书)

ISBN 978-7-81128-020-3

I. 曾… II. 王… III. 曾国藩 (1811~1872) —思想评论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456 号

曾国藩的思想与事功

王继平 主编

责任编辑: 阳 勇

封面设计: 罗志义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2-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 址: <http://xtup.xtu.edu.cn>

印 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8

字 数: 53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8-020-3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目 录

曾国藩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彭 靖 (1)
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徐泰来 (22)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早期先进文化·····	徐泰来 (35)
论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及其意义 ——兼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向·····	王继平 (48)
曾国藩哲学思想初探·····	章继光 (57)
曾国藩政治思想述评·····	章继光 (65)
论曾国藩的学术观·····	王继平 (74)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	章继光 (87)
论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与实践·····	章育良 (98)
曾国藩的经世之学及洋务思想 ·····	赵载光 (108)
简论曾国藩与程朱理学 ·····	唐兆梅 (115)
曾国藩与他的理学师友 ·····	王澧华 (126)
简论曾国藩的治学方法及其影响 ·····	成晓军 (134)
论曾国藩的行政管理思想与实践 ·····	罗依平 (141)
曾国藩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	罗玉明 肖芳林 (149)
试论曾国藩的教育观 ·····	成晓军 (157)
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及其影响 ·····	成晓军 (166)
曾国藩人才思想探微 ·····	唐兆梅 (174)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	殷绍基 (181)
论曾国藩与天津教案 ·····	许山河 (190)

► 曾国藩的思想与事功

曾国藩与靖港之役	唐增烈(203)
对曾国藩奏办粤厘济饷一案的考察	谢起章 杨奕青(211)
略论曾国藩对饷需筹集的重视	唐兆梅(224)
论曾国藩对外交涉的两面性	成晓军(231)
试析曾国藩洋务观的产生和形成	成晓军(240)
曾国藩的“羁縻驭夷”思想与晚清外交	贺 鉴 汪 翱(246)
曾国藩军事思想述评	章继光(258)
略论曾国藩的“治军方略”	唐兆梅(272)
曾国藩与会党	彭先国 何 凌(279)
略论曾国藩幕府	王继平(289)
曾国藩左宗棠比较论	王继平(297)
曾国藩胡林翼交谊考论	王澧华(308)
曾郭交谊与郭嵩焘筹饷	李永春(316)
曾国藩与洪秀全比较研究浅尝	沈家庄(334)
曾国藩的诗论和诗	彭 靖(356)
曾国藩的诗文风格论	章继光(367)
试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	殷绍基(378)
试论曾国藩诗学观、古文观的形成、发展与变化	王澧华(390)
曾国藩与桐城派简论	章继光(398)
曾国藩家藏稿本及其整理	韩长耕(410)
曾国藩奏章的历年刊刻及家藏草本的整理	韩长耕(420)
曾国藩奏疏研究	王澧华(427)
曾国藩诗文系年	王澧华(438)
编后记	(444)

曾国藩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彭 靖

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因而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人物。

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具有十分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容。曾国藩在这个历史阶段到来以后的32年中的活动,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而文化,又涉及哲学、历史、文学以及近代科学技术;而文学,又涉及诗与文两大领域里的许多重要作家、许多重要文体、诗体的创作成就及其理论总结的继承和发展。他在这样十分广泛的领域中的活动,既有明显的劣迹和不足之处,又有许多不易弄清其内容而为之作出公认的科学结论的大小事件。这些事件,现存的材料正反两方面的都比较多,全面搜集、整理、鉴别、辨认,分析,亦不易为。加之,近代史和现代史有其密切联系,与曾国藩有关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使人不无现实的敏感性。于是,对有些方面往往有所强调,夸大;而对另一些方面,则往往有所忽视,缩小。这也就更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曾国藩问题的复杂性,是他本身活动诸方面的内容造成的,也是整个近代史发展中的诸方面的内容造成的,也是他在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的多方面联系和影响造成的。要对这个人物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期得出若干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由这个人物进而对整个近代史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期于近代史上的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得出较为接近或一致的意见,可能就更难了。

我不研究近代史,对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曾国藩全集》的整理过程中接触到许多生疏的材料,觉得有些和学术界现有的某些论断挂不上钩。有些研究者从曾国藩这里拣出几句话作出一个论断,而另一些研究者又可以从他那里拣出另外几句话把这个论断推翻,或者提出疑义。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实事求是”,确不容易!

这里,就几个争论较多的问题说一点意见,和关心这些问题的同志商讨,向有关的专家、学者请教。

一

近代中国社会,内有广大人民群众和清王朝的矛盾,外有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其中,夹杂着清王朝与外来侵略者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着,构成极其复杂的情况。当然,主要的是前面两种矛盾。曾国藩无论在前面或后面两种矛盾中,几乎都处于中心地位。对许多事件,都不能不有明显的态度。

曾国藩的一生,就其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发展来看,可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为界,划分为前期和后期。在后期,自其总揽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政大权,坐镇安庆,指挥湘军进围南京以后,他的思想逐渐出现了较为重大的变化。当然,某些思想、政治主张则基本上是较为一贯的。

对人民的某些疾苦的同情,以“爱民”为口号,前后相较,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曾国藩早期的诗歌里反映的某些民生疾苦,这里且不说。咸丰元年(1851年),他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举民间疾苦三大项:“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于后者,他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沈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这不能不说他从一定的角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真实状况,为人民发出了呼吁。后来,在《日课四条·习劳则神钦》中,他说:

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黜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他在这里,把这种阶级对立现象称为“天下最不平之事”。而且用“酣豢”这样的词来形容富贵人家的“逸乐”。在他以前或与他同时的一些士大夫的言论

里,是很少见的。在对太平军作战期间,在《劝诫营官四条》中,有“禁骚扰以安民”一条。这一条说:

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责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掳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他还有“禁扰民之规”。这里,他说:

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特撰《爱民歌》,令兵勇读之。

在《批浙江处州陈镇国瑞具禀暂驻归德并饷项军火如何筹措等情》中,说得更为痛切:

本部堂统兵十年,深知爱民之道……闻该镇亦无仇视斯民之心,但素好苛派州县,州县转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转而虐民。焉得不怨声载道?自今以往,当痛戒之!昔杨素百战百胜,官至宰相,朱温百战百胜,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惨杀军士,残害百姓。千古骂之,如猪如犬;关帝、岳王争城夺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爱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愿该镇以此为法,以彼为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佑助。

又说:“凡设官所以养民,用兵所以卫民。官吏不爱民,是民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而在《谕巡捕门印签押》中,则说:“凡为将帅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要义;凡为督抚者以不需索属员为第一要义。”故在家信中,他说:“余在外立志以爱民为主。”并说:“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此也。”尽管他这样说,这样做,他统率的湘军仍然有扰民害民之事,他也并不讳言。在一封家信里,他曾说:“所虑者,败兵二万人拥塞祁门,满坑满谷,所在抢掠。油盐百物,皆无可买。”此亦可谓诚而无欺,故章炳麟在他的《检论·近思》里说:“曾、左知失民不可与共

患难……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又说：“而皆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群校所推，以曾、左为主。”章炳麟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是鞭挞不遗余力的。他在《检论·杂志》里曾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然而，他并不抹煞曾国藩“知失民不可与共患难”，且说“民之得伸，自曾、左始”。足见曾国藩所说的，并不是违心之言。这也不难理解。孔孟的学说是强调民心的向背对于一个政权的稳定与否所起的作用的。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较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大都懂得民心向背的重要性。“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他们往往从民心的向背来考察政治的得失。曾国藩是从反复阅读《二十三史》入手来研讨所谓经济之学的。他当然能深切懂得这个道理。他要维护和巩固封建的伦理秩序，就必然要争取民心。他反复强调“爱民”、“养民”、“卫民”，是高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物的。从这个角度说，他所以强调这些，也无非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也不是完全没有减轻疾苦的作用的。有些人认为曾国藩是“伪君子”，他说的许多动听的话，都不是发自内心的；他做的一些似乎不坏的事，都是为了制造某种假象以欺人。我不这样看。就信奉孔孟学说来说，他是真君子，不是“伪君子”。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说曾国藩“其无学不窥，默究精要，而践履笃实，始终一诚”。“诚”就“诚”在这里。他在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把在不同方面具有才能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个“诚”字是起了作用的。章炳麟说曾国藩“平生陟迫，喜修小怨，既得志，始慕修名，渐忍性为大度。赏劳举功，未尝先姻私。位至将相，功名已盛，而国藩家人络纬，堂居不改先畴题署”^①与此是不无联系的。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首先提出太平军与老百姓的关系，痛诋其对老百姓的扰害现象，就是在上述的认识基础上所采取的对太平军作战的一种精神策略。当然，不一定都符合事实。太平天国运动，我以为可以定都南京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为一个反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而起的运动，无疑是正义的。在纪律上的要求是较为严明的。这也体现了正义之师的一个重要特色。但以其始终是一个小生产者的运动，加之领导者的意志不一定都能变成整个起义队伍的实际行动，因而发生某些违反纪律要求的现象，是不足奇怪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外国人写的《太平天国初期纪事》，就写到了两方面的情况

^① 章炳麟：《检论·近思》。

况,一方面是“叛军占领了这三座城(即永安、水窦、莫邨)以后,即行安民,生命财产,秋毫无犯”^①。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叛党的成功,并不能使他们的事业得到荣誉;他们足迹所至,都掳掠烧杀,攻陷城市后即施行罕见的洗劫,受害的人民毫无理由受到这种荼毒。因为他们本来便在帝国的苛政下受难。叛党中的知识分子和富人并不赞成这些令人叹惜的暴行,然而无力制止。”^②这也许不是毫无根据。而从《殿右捌指挥杨告获港镇人民札谕》中“再敢迟延限期,定即尽行剿洗,决不稍宽”之语看来,则是言而有据了。而其跨入后期,即开始了它的蜕变过程。愈到后来,就几乎完全变了质。其中,正义的进步的因素虽不无保存,然已不起大的作用;而前期未能克服的一些弱点,则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所以章炳麟虽是赞成太平天国的,而在《检论·近思》里也不得不说:“洪氏以夏人挾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闻,又横张神教以轶干之。”

当然,曾国藩对太平军战士也是极其残酷的。他在日记里就曾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从这几句话,亦可见其狰狞之状。既不以多杀为悔,那么,稍有涉嫌者自亦不免血刃相加了。

这里,应该指出:曾国藩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出发,罪及无辜,与太平军前期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大兴义师中未能克服的某些纪律执行上的缺点,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这里,我想说一个与此相联的问题,那就是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强调的“维持名教”的问题。

章炳麟在《检论·近思》里说:“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不但如此,曾国藩留下的著作和钞纂之类的文字不下1500万字,我们翻阅了一大部分,还没有发现他对当时的革命人民提出的“反清复明”的口号有所诋诬的话。相反,他对顾亭林等明代忠烈之士还倍加赞颂,后来,他在南京为王船山刊行遗书,章炳麟也以为“可谓知悔过矣”。当太平军东下金陵以后,他奉清王朝之命,率湘军出境作战,正如李元度在《曾文正祠雅集图记》里所说:“濒死者数矣,而公百折不回。”究竟为了什么?他说:“不但为亿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见《讨粤匪檄》)这里存在着一场尊孔与反孔的

① [法]加勒利·伊凡:《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② [法]加勒利·伊凡:《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斗争。论者每于曾氏全加否定；而于太平天国则全加肯定。我以为二者都未免失之片面。近于《光明日报》读谷牧同志《孔子研究·发刊词》，获得很大启示。这篇文章于肯定“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以后，指出：要“以历史上的‘尊孔’和‘反孔’为鉴，既不盲目地推崇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对之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是主张把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的对象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平天国时期，洪杨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孔子，把孔子包括其学说的精华部分全都加以否定；而曾国藩则从右的方面来推崇孔子，把孔子包括其学说的糟粕部分全都加以肯定。今天看来，都是和我们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的。而细加研讨，我们会发现：太平天国的首领人物否定孔子，主要不在否定封建伦理，而在于肯定“皇上帝”的独尊。相反，他们对封建伦理几乎全部承袭下来，有些方面如等级制度、男女之别还变本加厉。甚至连曾国藩尚不愿意做的，他们也做了。这也可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曾国藩的态度如何呢？

我最近读到一本新出的《左宗棠评传》。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作者写道：这“是鉴定左宗棠是否具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爱国特点的试金石。如果把他在战争期间的言与行与曾国藩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是坚定的爱国派，一个是彻底的投降派，形成尖锐的对照”。定曾国藩为彻底的投降派，根据是什么？作者引曾国藩在《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写的家信中的这么两段话：

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海疆平定以来，政简人和，雍熙如旧。

这确是曾国藩的话。根据这两段话，是否可以定他为彻底的投降派，暂且不说。先看看在此时期他另外几封家信中的一些话。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41年10月29日）给他父母：“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十月十九日（1841年12月1日）给他父母：“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1842年2月27

日)给他父母:“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二月二十四日(1842年4月4日)给他父母:“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四月二十七日(1842年6月5日)给他祖父母:“英夷去年攻占宁波府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静如无事时,想不日可殄灭也。”六月初十日(1842年7月17日)给他祖父母:“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滋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天津防堵甚严,或可无虑。”七月初四日(1842年8月9日)给他父母:“逆夷在江苏滋扰,于六月十一日攻陷镇江,有大船数十只在大江游弋。江宁、扬州二府颇可危虑。”

从上述这些话,可见他认为英国侵略者是“极可痛恨”的,助寇为虐的汉奸是“丧尽天良”的,而于“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滋扰”是不满的,怎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曾国藩竟是一个和左宗棠对立的彻底的投降派呢?如果联系他的诗七律《酬九弟四首》之二来看,问题也许更清楚,诗云:

汉家八叶耀威弧,冬幹春胶造作殊。
岂谓戈鋌照京口,翻然玉帛答倭奴?
故山岂识风尘事,旧德惟传嫁娶图。
长是太平依日月,杖藜零涕说康衢。

这首诗正写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起联夸耀过去的武功,颌联对比地写到现实,乃仿杜甫《诸将》句“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而作,明显地表示了对清王朝所采取的投降政策的不满。颈联写到远离京城的故乡的人民还像往常一样嫁往迎来(也可说是“雍熙如旧”吧),哪里知道这些令人难言的风尘中事!末联上句承颈联下句而来,下句则宛转地表达了对“太平依日月”貌似感激而实含痛楚之情。婉而能讽,可谓怨而“不怒”。这难道能出于一个投降派,而且是“彻底的投降派”之手吗?几年来的事实,使他得出这样的认识:内而“将不知兵,兵不用命”,外而敌人已“扼吭而据要害”,故不能不“权为和戎之策”,尽管他明知有“损国威”。上述《左宗棠评传》摘引的前一段话略去了这样几句:“议抚之事,系伊里布、耆英及两江总督牛鉴三人。牛鉴有失地之罪,故抚局成后即革职拿问。”这也可隐约地看出:他对这个“抚局”是不无看法的。然而这已成事实还说

什么呢？所谓“以大事小，乐天之道”。“政简人和，雍熙如旧”，只能说是一种强自宽解的“阿Q”精神，无论如何还说不上投降派，而且是“彻底的投降派”！这种宽解语，如果把它和“长是太平依日月，杖藜零涕说康衢”之句并起来看，人们也许会觉察到这语笑声中也还有悲祸之泪啊！后来，他在家信里，说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有过这样的话：“余近年在外，问心无愧，死生祸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吉利、法郎西、米利坚各国通商条款，大局已坏，令人心灰。”^①也是同样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的表白。张裕钊论及曾国藩于“海疆事变”所采取的态度与对策，曾说：

是时海疆事变，亦乘间并作……文正公以为不量彼己而轻挑强敌，是以国注也；不修备而媮久无事，是自削也。是以戢锐养威，外壹务为怀柔，而内自愤发，以徐图自强之术。日夜与在事数巨公，通变吏俗，兴起诸务。^②

这可能是说得较为全面的。当然，“外夷务为怀柔”，亦不无可议处；然断定为投降派，而且是“彻底的投降派”，是未必适合的。曾国藩死后，左宗棠亦称其“谋国之忠”“自愧不如”，这不当为一般的赞叹语。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曾借“夷兵”以“助剿”。论者曾视为“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同是外国反动势力，太平军亦曾试图以其教谊与之联系，希望取得支持，曾国藩既与太平军处于敌对状态，借一切力量以“助剿”，是不足为怪的。问题在于：太平军能窥破其条件的不合理而拒绝其“支持”；而曾国藩则相反！这也可看出：太平军与外国侵略者毕竟是不相容的；而曾国藩所代表的清王朝，在一定条件下，与外国侵略者是可以合作的。这里，有一种实质性的区别。但以曾国藩与其营垒中的另一些人物相较，则又有其不同点。吴汝纶在为其所作《神道碑》中有这么一段话：

初，咸丰三年，金陵始陷。美利坚人尝谒江南帅，愿以夷兵助战。十一年，和议既成，俄罗斯、美利坚皆请以兵来助。公议以为宜嘉其效顺，而缓其师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兰西又以为请，公又议以为宜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16页。

② 《濂亭遗文》卷二。

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廷议购夷船,公力赞之。比船至,欲用夷将,则议寝其事。^①

这在清王廷中,似乎还只有曾国藩一人。吴氏所叙,证以曾国藩在江宁和议后仿杜甫《诸将》中“岂谓”、“翻然”之句为诗以表示其不满之情,似尚可信。

二

有同志说: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研究曾国藩,要看他对这场变革采取什么态度和对策。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变革的内容和性质是什么?曾国藩在这个变革中所处的地位是什么?他能做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这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曾国藩死于1872年。距戊戌维新运动16年,距辛亥革命27年。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曾国藩作个维新派中人,更不能要求曾国藩作个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人。曾国藩当然不能触动清王朝的统治。他只能在承认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个前提下考虑问题。他考虑所得,也只能依靠清王朝给予他的一定的权力来推行。他在《杂著·劝诫委员四条》里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他的改革就是从四方面进行的。就军事方面说,他从战略、战术到营制、营规,再到征募、训练方法,再到兵器制造,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彻底清除了八旗兵、绿营兵的一切陈规、陋习,使他所创建、统率的湘军以及在他指导、支持下建立的淮军具有一定的战斗力,造成了所谓“同治中兴”。薛福成在《代陈忠勋事实疏》里,说他“手订《水陆营制一编》”,“其所定人数之多寡,薪粮之隆杀,皆参酌时势,简要精严,允为久远不敝之规”。就吏事方面说,他曾手定各种章程,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取得一定效果,诸如《劝诫州县四条》,有“一曰治署内以端本;二曰明刑法以清讼;三曰重农事以厚生;四曰崇俭朴以养廉”。而《劝诫委员四条》,则有“一曰习勤劳以尽职;二曰崇俭约以养廉;三曰勤学问以广才;四曰戒傲惰以正俗”。《劝诫绅士四条》,则有“一曰保愚懦以庇乡;二曰崇廉让以奉公;三曰禁大言以务实;四曰扩才识以待用”。而所有这些条例,均有其具体要求、奖惩办法以及实施方案,其效果,薛福成在《代陈忠勋事实疏》里,曾说:“劝农课桑,修文兴教,振穷戢暴,奖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官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又

①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文集》。

► 曾国藩的思想与事功

“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实惠及民”。这不免有所夸大，但不致全非事实。至于饷事方面，如改革商运、盐运、税利等制，虽未必真如薛福成等所说“商民乐业，上下获益”，然较之前例，当不无可取。文事方面，后面将有所涉及，这里就不说了。

所有这些改革，能否收到实效，曾国藩亦知其关键在人才，他在《书札·致胡莲舫》中说国藩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他在这里，把人才列之首位，是不未见地的。对人才的标准，他在《笔记十二篇·才德》中说：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按：他在这里，没有说得像司马光那样绝对，也是他比司马光高明处。）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于德与才的关系的阐述，在他以前或与他同时的人的言论中，恐无此详切明透的了。至于人才的类别，他在《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说：

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贤士：凡孝友为宗族所信，睦姻为亲党所信者，是为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担当难事，出财以襄成善举者，是为有才之科；凡工于文字、诗赋，长于经解、策论者，是为有学之科。

后者，后来还加上通乎天文、算学等科学技术之士。最近，岳麓书社重印了李鼎芳编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其《幕府人物总表》所列，即达89人。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方面，都有其专门人才，而且很多是当时第一流的人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都是当时精通天文、算学、化学等科学技术的人才。至于人才培养识拔之道，他在《应诏陈言疏》里，提出了四条：“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关于“保举”，他在《奖借人才，变易

风俗》中说：“今之牧令，即古乡大夫之职，本有兴贤举能之责。”因此，他要“州县采访、保举”，并规定：“一县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无所举，及举而不实者，该牧令皆予记过。”他还提出：“不许荐引私人！”因为，“纵有过失，互相隐蔽，勾通袒护，为患甚大”。与此同时，他于营弁还规定：“不许收受银礼！”“即茶叶、小菜，至亲密友赠送微物，若非禀明本部堂再三斟酌者，概不准收。倘有隐瞒收受者，重则枷号棍责，轻则递解回籍。”他又声明：“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各随员指摘谏争，立即更改。”至于人才的自我修养，他根据诸葛亮“才须学、学须识”之旨，强调自我学习，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一“勤学问以广才”中，他要求于军事、吏事、饷事、文事，“务宜精究一事”。“讲究之法”，他说：“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自觉矣。”而在“扩才识以待用”中，又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这里，他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禁大言以务实”。他于部属，说：“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选才、养才是为了用的。如何用？他主张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在《笔记·才用》中，他说：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室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骐驎不可以守闾。千斤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才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铢铍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这在他以前或与他同时的人的言论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做到这样深切著明的，而这样大量使用比喻，又皆生动切当，乃从孟子、苏轼而来。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就连石达开也说：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左宗棠也谓其“知人之明”，“自愧不如”。

这里，我想说一说曾国藩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这是他在军事方面进行的一项重要改革。而其对于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却远非军事这一方面所能限。

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内容和作用，学术界还在讨论，许多问题似乎还没有

得出较为一致的意见。但这个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大家的认识似乎是比较接近的。我对这个运动没有进行过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对有关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发言权。这里,只想就曾国藩对这个运动的倡导说一点意见。

曾国藩倡导这个运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般都认为,这只是镇压农民起义。我觉得这并不全面。如前所说,他认为“不量彼己而轻挑强敌,是以国注也;不修备而媮久无事,是自削也”。所以他“戢锐养威,外壹务为怀柔;而内自愤发,以徐图自强之术”。这也是针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来的“自强”之一术。他论制“群子”,曾说:“不仁之器,盖莫甚于此矣。然海疆尚未静谧。此其亟宜讲求者也”。这不是明确地说明了他的目的所在吗?如果说,这还说得不充分,那么不妨再看他两段话:

欲求外交之胜利,宜先求自强之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弹,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使彼之所长,我尽有之。

使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应该说,这已经说得够充分了。薛福成在《代陈忠勋事实疏》里有一段话,也不妨一读: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要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繙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这难道是凭空而发的吗?

曾国藩倡导这个运动的实绩,现在看来,当然并不那么辉煌,其意义在于:他手上制造的,是中国的第一艘轮船;他或在他支持下创建的,是中国的第一个军械所、机器制造局;他建立的,是中国的第一个翻译馆;他送出去的,是中国的第